

新文化运动时期墨学文化传播

张玲玲
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枣庄 277100

摘 要：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基于救治时弊、救亡图存和对接西学的需要，研究和传播墨学文化，促使蒙尘近二千年的墨学重见光明，并得以研究和宣扬。本文从文化传播“5W”的视阈梳理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墨学传播的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的情况，为现代墨学的创新型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及宣扬传播提供借鉴及启示。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墨学；5W 传播模式

引言

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新旧文化激荡较量的时代，也是政治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其时，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面临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努力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西为师；一方面自信地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民族气质和民族特色的精神资源实现救亡图存。在西学东渐的刺激下，新文化运动的 知识分子开始反省传统文化的“唯儒独尊”的文化状态并意识到其存在的严重问题，即不能实现中西文化有机融合和救治时弊，也无助实现救亡图存。文化自尊感和优越感的心理促使把目光转向非儒学文化并惊讶地发现墨学文化能够救亡图存和社会发展提供出路。于是，墨学的思想价值受到广泛推崇，研究和宣扬墨学文化出现空前热潮，“墨学几乎成了一种时髦风尚。”^[1]因此，先秦非儒学派特别是蒙尘二千多年的墨家重见天日，得以兴起，“墨学热”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颇为关注的现象。

1948 年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在其论文《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首次提出了构成信息传播过程包含五种基本要素，并按照一定的框架结构和逻辑顺序将它们进行排列，这五个基本要素分别是：传播者（who）、传播内容（what）、传播媒介（in which channel）、传播受众（whom）、传播效果（with what effect），后来人们概况并简称为“5W”模式。这五个组成部分所发挥的功能和研究内容有所不同。本文按照“5W”模式对构成墨学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进行详细解析，分析和研究新文化运动期间墨学文化传播。

表 1 “5W”模式的五种基本要素及功能

传播者	传播内容	传播媒介 / 渠道	传播受众	传播效果
who	what	in which channel	whom	with what effect
谁	说什么	通过什么渠道	给谁	取得什么
控制研究	内容分析	媒介分析	受众研究	效果研究

1. 近代墨学传播的主力军：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贯通中西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体

表 2 人员名单

姓名	出生年	文化程度	职业	留学国家	创办期刊
陈独秀	1879	大学	教授 编辑	日本	新青年
李大钊	1889	大学	教授 编辑	日本	《新青年》《每周评论》主要负责人
胡适	1891	大学	教授 编辑	美国	国学季刊新青年编辑
鲁迅	1881	大学	教授 编辑	日本	新青年编辑
易白沙	1886	大学	撰稿人编辑	日本	新青年撰稿人
钱玄同	1887	大学	教授	日本	
章太炎	1869	大学	教师编辑	日本	开办国学讲习会
吴虞	1872	大学	编辑	日本	新青年编辑

第一，这批知识分子是中国近代最早一批贯通中西文化的年轻知识分子群体，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与广阔的 国际视野，通过比附西学阐释墨学，最终选择墨学作为救国救民的重要理论武器，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骨干。

这批新文化运动的骨干是我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跨世纪的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 19 世纪的“80 后”“90 后”。他们在少年时期接受过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旧学功底深厚，“为生民立命”的民族使命感和“为往圣继绝学”的文化使命感内化于心，形成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浓厚家国情怀。青年时期他们中的有的人在国内就读于近代新式学堂，学习和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文化，绝大多数远渡重洋接受高等教育，经历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文化，中西文化贯通，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同时，他们还长期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历史考据和典籍整理的兴趣。

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的大门，近代中国逐步沦陷于水深火热被动挨打的处境，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亘古未有之变局”，先进分子开始强烈感受到民族危机，为实现救亡图存和富强，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真理。从开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器物学习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制度学习，但辛亥革命的失败让知识分子猛然醒悟：“从海上袭来的外国文化，不同于中国较长时期了解的伊斯兰文化，甚至俄罗斯文化；不仅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不同。”^[2]他们醒悟后，痛定思痛，进行深刻的反思，认为：“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多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报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3]此时，中国急需一场能够启蒙思想、洗涤心灵的文化变革运动。他们意识到“适应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所谓平等、人权之信仰。”^[4]他们认为改造当时社会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用西方文化尤其是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文化中的核心要素进行文化觉醒和思想启蒙，启迪民众愚昧的心灵，从而为资本主义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建立扫除障碍。而长期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学已经无法为救亡图存、救时弊、启迪民智和解放思想提供理论支撑和精神动力，“湮塞人智”恰恰成了阻碍自由、平等、博爱为本的西方文化特色伦理观念在中国宣扬的最大的文化障碍，“为祸之烈”。知识分子的文化自尊感和优越感的心理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和源头先秦时期，并希望从非儒学的“小传统”文化资源中探求救国救民的精神资源。

但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自由、平等、博爱为本的西方文化特色伦理观念若在中国扎根、发芽、开花、结果且让中国人普遍认同接受，除了在内容方面能够对接之外，还必须体现群体本位主义的中国文化特色。他们惊诧地发现墨学文化是与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科学等文化要素最接近的思想文化，于是他们掀起了墨学救国的运动。

第二，这些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从事传媒行业或职业。

随着近代出版业的发展，出版印刷为公众传递信息、塑造公众观点和态度、养成行为和传播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骨干大部分从事传媒行业或职业。

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李大钊是《青年杂志》和《每周评论》的主要负责人和撰稿人，胡适创办《努力周报》，且是《国学季刊》《青年杂志》的编辑，章太炎创办国学讲习会，易白沙、钱玄同是多家报纸和期刊的编辑或是特邀撰稿人。他们的职业为墨学文化的宣扬提供了便利和推动。

2. 墨学传播内容：关联救亡图存、契合西方文化。

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挖掘和传播墨学思想资源主要是基于实现救亡图存的时代任务和扫清民主共和障碍的政治诉求。所以，墨学传播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救亡图存关联的内容，实现救国；二是与西学契合的内容，对接西学。

第一，从墨学与救亡图存的现实关系出发，传播兼爱、非攻、节用、尚同等内容救亡图存。

鸦片战争后，国家蒙辱、民族蒙羞、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爱国救亡是时代主题。不同社会力量对中国“向何处去”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辛亥革命，以革命方式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其后思想领域尊孔复古逆流泛滥猖獗。面对猖狂的尊孔复古的逆流，先进知识分子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苦闷和彷徨之中。他们进行深刻反思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虽然遭到了挫折和困难，但仍然是救民强国的最佳出路和中国前途，如果在中国扎根，就必须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找到与之相对接的精神资源。反观长期占据精神统治地位的儒学发展已经陷入时代发展需求的困境，其内容不能与西方文化契合，阻碍民主共和扎根中国，不能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陈独秀认为“共和立宪制，

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5]而以三纲五常和等级制度为核心意义的儒学绝不容许共和制的存在,“完全不识共和为何物”,^[6]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出路,甚至成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7]吴虞认为儒家“君为臣纲、父位子纲、夫为妻纲”的专制性的压抑已经无法为救亡图存、解决社会时弊提供理论支撑,质疑社会“安能得真共和”^[8]。“尤喜墨家责任侠”的易白沙墨学的现实救亡意义进行酣畅淋漓的赞扬,高度评价和热烈宣扬墨学的救世精神,相信只有学习、研究、宣扬和利用墨学精神才能实现消除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如子墨子矣。”^[9]他认为中国正处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的双重夹击的时代困境,正如以“振世救弊”著称的墨学产生的时代环境。所以,相似的时代环境使得墨学中的“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勇于振世救弊”果敢精神以及“精于制器”的科技精神是挽救民族危亡的灵丹妙药。他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强调墨学中的“兼爱”“非攻”“节用”等学说均“不可缓也”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他认为墨学中的“兼爱”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欺诈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侵略,尤其是强国对弱国的侵略;“节用”可以矫正社会奢靡风气、解决社会贫富悬殊差距,财货不足的社会时弊,消除国家经济命脉被帝国主义控制带来的经济落后的困境;“非攻”可以巩固国防,加强防御,抵抗战争,尤其是强国对弱国的战争。这些宣扬的内容正表达了当时中国人的救亡图存的情感和政治诉求。正是对墨学精神的高度认可和评价,易白沙呼吁“非举全国之人,尽读墨经。”^[10]

民族危机的加深,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认为墨学是“堪称救世之良药”。所以,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是从救亡图存的实际需要出发研究和宣扬墨学,新文化运动期间宣扬墨学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墨学文化与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相结合。

第二,从墨学与西方文化对接的关系出发,传播墨学中科学、民主、人权等内容沟通西学。

任何一种异质文化被接受都不是简单孤立的,因为人们在接受异质文化时总是秉承固有文化心理习惯性,把已有的本土文化作为理解陌生异质文化的工具,从而进行两种异质文化的比较与融通。“任何对历史文本的阐释都是

一种视界的融合,阐释者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是决定阐释者对文本意义的读解方式的重要因素”^[11]。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阐释西方文化时也不例外。

面对西方文化的突如其来冲击和挑战,他们面临一个极为紧迫的任务就是在民族传统文化中找到能够与西方文明相对接的精神资源,以便在中外文化融合的基础上能够熔铸为国家提供出路的思想武器。新文化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自幼好墨,所以,他们把自己熟悉的墨学比附西学进行阐释与互通。

首先,胡适以他服膺的西方实用主义方法作为切入点,以西方学说比附墨学相互阐释。他比照西方的科学和逻辑学方法比照研究墨家哲学和逻辑学,认为墨家存在的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与西方的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相媲美,重新确立了墨辩逻辑学在世界逻辑史上的地位。墨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派别中“最能与现代科学、逻辑产生共鸣”的文化派别。墨学为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传入提供合适的土壤。

其次,将墨家的核心思想与西方学说沟通。根据文化趋同原理,西方文化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与其相对接的文化派别和内容。墨学传播从适应时代需求的角度进行义理阐释和中西文化比附研究,提炼出适合当时社会所需的时代精神和文化价值。易白沙认为墨家的兼爱、尚同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等思想能够巧妙的融为一体。吴虞从墨家的价值体系中找寻、解读与西学的契合点:墨子之兼爱等同于耶稣之博爱平等;墨子之明鬼等同于苏格拉底之信重鬼神,墨子之非攻等同于俄皇弭兵之旨等。陈独秀坚信:“必须启发群众觉悟,使之与封建的伦理观念决裂,而代之以新的伦理观念,即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本的西方文化特色伦理观念。”^[12]而与“自由”“平等”“博爱”对接的恰恰就是墨学核心内容。

因此,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认为墨学与西学的相通性促使知识分子赋予墨学勾联西学的重任,墨学为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提供肥沃的文化土壤和合理的生长点。

3. 近代墨学传播的主要大众媒介

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近代出版业和新闻媒介已有了较大发展,出版机构数量也大幅增加,报刊、杂志、著作成为当时主要大众媒介,促使思想文化的传播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革,对启迪民智、解放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和新道德。后来,迁到北京大学,《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传播新文化的两大主阵地。李大钊、胡适、鲁迅担任主要撰稿人和编辑。《青年杂志》也成为了批判孔学、宣扬墨学的主要阵地,陈独秀、胡适、吴虞、易白沙等在《青年杂志》发表多篇宣扬墨学的文章。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凭借经济实力和军事霸权取得了在中国随意办报纸、创办杂志、出版图书的特权。据统计,新文化运动期间,报刊和杂志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多达几百家,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青年杂志》《甲寅杂志》《每周评论》《中国学报》《学灯》《华国月刊》等知识分子创办的非官方杂志是宣扬墨学的主要报刊。其中,《青年杂志》不是一般意义的新闻期刊,而是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文化期刊,承担起了思想启蒙的历史重任,从创刊初始就研究和宣扬墨学文化,刊登发表了有关宣扬墨学的文章多达几十篇,是当时最主要的墨学文化传播的杂志。其时还出版传播墨学文化的著作,主要有胡适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和后来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易白沙的《述墨》《墨学》《我》,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陈独秀致他人的书信等。

4. 传播效果和受众对象

由于新文化运动是处于中华民族的内忧外患比较严重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所以,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传播墨学是基于解决社会时弊、实现救亡图存、反对封建专制和宣扬民主共和的政治诉求,墨学思想恰与这些社会需求不谋而合,因而得以青睐并加以利用,所以墨学的传播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而不是出于对墨学的纯粹的学术研究或者最终目的并不是认为墨学是好的文化而进行宣扬。所以,墨学是救亡图存、反对封建专制的思想武器和引入西学的媒介,其“工具人”的角色决定了墨学传播的功利性和短暂性。作为应对西方文化挑战、引入西学媒介和手段的“工具人”,尤其是随着陈独秀等人思想的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变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步进入到中国后,其“工具人”的功能在下降,导致墨学传播的短暂性。

任何一种思想文化要想成为社会主流文化且被民众普遍接受,就必须借助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使之成为政治意

识形态,毕竟官方的认可和政治引导是重要的传播方式。代表“贱民”利益的墨学,尤其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宣扬的民主、兼爱、节用、平等、平民等思想强烈冲击着封建特权等级制度和统治阶级的权利和地位,违背统治阶级的意志,自然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主动传播。在当时传播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掌握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作为当时文化传播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信息源,不会主动宣扬违背和损害自身意志和利益的思想文化。新文化运动时期墨学宣传仅仅依靠不掌握国家机器和国家意志的少数知识分子用呐喊的方式和文化的手段,缺乏“官本位”文化思想的引导,缺失政治力量作为其坚实后盾,缺乏国家制度保障和政策指导。自上而下的传播路径受到阻碍,造成其传播效果的差强人意。

所以,正如前面所述,墨学传播主体局限于具有爱国主义情怀贯通中西文化但不掌握国家机器的特定的少数知识分子群体的狭隘圈子,且缺乏意见领袖。何为意见领袖?简单来说就是在一定领域内居于领袖地位且具有“粉丝”效应。意见领袖的言行往往会影响着更多的受众,使其传播的思想文化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与接纳。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在文化领域内具有公认的“领袖地位”,但由于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普通民众对于文化传播乃至中国救亡图存的重要作用,没有主动下沉到民众群体中进行墨学宣扬,没有与民众产生情感共鸣,产生“粉丝”效应。意见领袖的缺乏致使下层民众接受、传播墨学的可能性不大。

新文化运动的的知识分子虽然起始已经意识到要把这场文化运动扩展到社会底层和广大农村,但由于受时代、阶级和媒介条件的限制,导致知识分子没有深入群众,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致使其影响力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和大中城市,没有延伸到普遍群众和广大的农村,对广大中下层民众和广大农村影响力有限。毛泽东说过:“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之中……,实际上还可能只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3]“如果知识分子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14]是毛泽东从新文化运动中得出的文化运动发展的深刻启示。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朋友圈的狭窄,最终导致墨学取得一定复兴,但传播力是有限的。

5. 总结

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对西方国家的侵略加深和西方文化突如其来的冲击和挑战,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大批关切时务的爱国知识分子摆脱不了自我文化中心的束缚,煞费苦心的从传统文化中找到与西方文化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要素相似之处的墨学,把墨学看作是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尝试发掘和宣扬墨学文化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复兴墨学寻找救治时弊的良药、批判儒学独尊权威、对接西学的生长点。墨学的宣扬对于当时民众的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起到了推动作用。但由于墨学文化传播主体的匮乏、传播内容的“功利化”、传播媒介和渠道的单一、受众对象的狭窄导致传播效果不太好。

参考文献:

- [1] 胡适. 翁方纲与墨子 [M]. 胡适文集 (第四册胡适文存三集), 第 470 页.
- [2] 刘景泉. 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研究 [M].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6:592.
- [3] 陈独秀. 吾人之最后之觉悟 [J]. 新青年, 1916, 1(6):379.
- [4] 陈独秀. 宪法与礼教 [J]. 青年杂志, 1916(1).
- [5] 陈独秀. 吾人之最后之觉悟 [J]. 新青年, 1916, 1(6):379.

[6] 陈独秀. 再答吴又陵 (孔教) [M]. 陈独秀著作选编 (第一卷), 363.

[7] 陈独秀. 再答俞颂华 [M]. 陈独秀文集, 第 344 页.

[8] 吴虞. 读荀子书后 [M]. 吴虞集, 第 51 页.

[9] 易白沙. 述墨 [M]. 易白沙集, 第 55 页.

[10] 易白沙. 述墨 [M]. 易白沙集, 第 55 页.

[11] 何显明. 毛泽东的心路历程 [M]. 学林出版社, 2002:277.

[12] 陈独秀. 吾人之最后之觉悟 [J]. 新青年, 1916, 1(6):379.

[13]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1:700.

[14]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M]. 人民出版社, 1991:559-560.

作者简介: 张玲玲 (1980-), 女, 汉, 山东枣庄, 枣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要基本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墨学文化的传播困境及突破研究” (20CKSJ13); 山东文化艺术科学重点项目“乡村战略背景下枣庄地区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实现路径研究” (201806469)。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应用研究项目: “一带一路”视域墨学文化传播研究 (2019-SKZZ-37)。